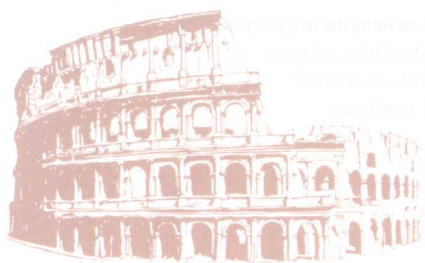


主编 郝时远 朱伦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Translation Series

民族学人类学译丛



Nations and States: An Enquiry the Origins of N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民族与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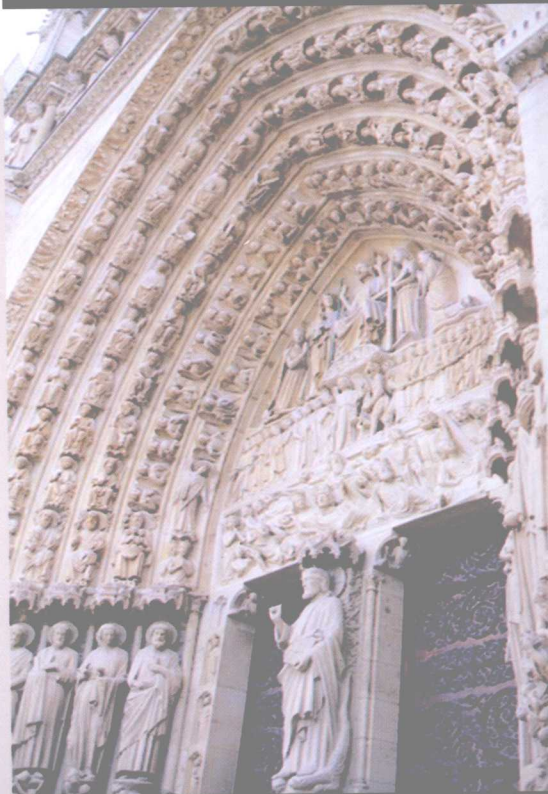
——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

[英] 休·希顿-沃森 / 著

吴洪英 黄群 / 译

本书是一部论述“民族与国家”问题的权威性著作。作者全面剖析了民族与国家这两个影响人类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基本实体，描绘了世界民族主义概貌，分析了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问题；着重论述了欧洲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作者认为，民族与国家重叠交叉、相互影响，但具有本质区别，只有把握其本质区别，才能避免犯错误。

“民族会因语言、历史和文化等纽带而在国家消亡后还存留数个世纪之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民族与国家

——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

[英] 休·希顿-沃森 / 著

吴洪英 黄 群 / 译

吴洪英 / 校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与国家/(英)沃森著;吴洪英,黄群译.—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1

ISBN 978-7-81108-620-1

I. 民… II. ①沃…②吴…③黄… III. 民族—关系—
国家—研究 IV. C9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4518号

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

策 划 戴佩丽

作 者 休·西顿-沃森

译 者 吴洪英 黄群

责任编辑 方 圆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21.625

字 数 543千字

印 数 2000册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620-1

定 价 54.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中国的翻译历史十分久远，先秦文献有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华夏互动关系的记述，就包括了翻译的桥梁作用，即“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①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翻译不仅在“五方之民”及其后裔的漫长互动关系中始终发挥着沟通理解作用，而且也是中国认识世界、引进域外思想文化的工具，其中佛教经典的翻译可谓最大的工程。

近世“西学东渐”是中国社会步入世界现代进程中的巨大动力。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屈辱中开始重新认识世界，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魏源进而增修汇编的《海国图志》，开启了中国近代译介西学的先河，即所谓“中国知西政之始”。译介西学是中国仁人志士从过去视域外技艺为“奇技淫巧”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变革，而甲午之后则成为中国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之急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的推动和身体力行，使“西学东渐”的规模和内容逐步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其中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著作也渐次介绍到中国。如1902年章太炎翻译的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1903年，林纾、魏易根据英译本，翻译的德国民族学家哈伯兰的《民种学》(Ethnology)，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著作《天演论》，均属西方民

^① 《礼记》，“玉制”，第五，引自《十三经注疏》。

族学、人类学著述进入中国的开山译作。

中国虽然有编写民族志的历史传统，但是作为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化发展则仅有百年的历史。在推进这些源自西方的学科本土化发展进程中，译介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代表作，一直是推进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建设之一。因此，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早期开拓者和著名前辈，往往也是从译介国外民族学与人类学名著名篇开始其学术生涯，而这一治学特点也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推进学科建设、发展学术事业的自觉传统。百年来，中国学界对国外民族学与人类学著作的翻译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所偏重，但是可以说从未间断，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理论流派和前沿话题，基本上为国内学界所熟悉，并在本土化运用中发挥着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学、人类学的译介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国外民族学、人类学的历史经典、现代新作不断为学人所译介，如1979-1994年的《民族译丛》杂志即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学术翻译载体。同时，国外民族学、人类学著作的翻译也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有30多家出版社相继推出了数以百计的民族学、人类学译著，而且近年来呈现系列性刊布的发展趋势。这些译著涉及面之广，不仅涵盖了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经典民族志，而且涉及了民族学、人类学的诸多分支学科。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不断融入国际社会，在与世界互动进程中实现发展。中国的学术事业也是如此，在持续和不断深入的国际交流中走向繁荣。其中译介国际学术的最新成果，是实践学术交流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面对着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其中民族问题即是具有普遍性的领域之一。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这一问题关注和研究，是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重要的智力源泉。民

族问题历来与诸种社会问题渗透交叉，无论是对民族大千世界而言，还是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领域，以及人口、宗教、语言、人权、生态、城镇化等专门话题，都是民族问题的题中之意。而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分支化发展，与其他学科的不断交融，其中必然地包括了适应民族问题普遍性、复杂性、长期性、重要性和国际性特点的意义。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民族学人类学译丛》，基本主题属于民族政治学或政治人类学范畴，突出了民族（nation）、民族主义（nationalism）、族性（ethnicity）、族群（ethnic group）理论概念的研究特点，包括了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少数人权力（minority rights）和前苏联的个案研究，提供了政治人类学导论和世界范围族群口径的分类资料，其目的是为了就国内诸多学科所关注的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多元文化、公民身份、少数人权力的研究和有关“族群”概念的理解、争论和应用，提供更多的学术参考。在这方面，相关译者和出版社已经推出了一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这套丛书将进一步就同类话题展开更广泛的学术探究，以满足国内学界不断增强的学术需求。

毫无疑问，在学术翻译中，概念体系的对应或新构历来存在着困扰。诚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曾面对近世“西学东渐”不脛而走的大量新概念所说的那样，“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系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骛骛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①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民族”、“族群”这类概念的研究、阐释和论争，也是如此。所以，在这套丛书翻译过程中，基

^①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载《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7页。

本概念问题依然是难点，期间虽然力求统一，但是每一个译者对同一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且直接关系到对其论理的理解。因此，在这套丛书中我们要求译者尽可能地保留一些基本概念的原文，以使读者全面准确地理解原作的意义，我想这也应该成为学术翻译的基本规范。

概念及其定义，是对相关要素、特征的概括和理论阐释的支点。因此，沃勒斯坦认为：社会科学文献的翻译实际上是概念的翻译问题，因为社会科学的讨论往往以概念为核心，而概念又是经过作者自己清晰界定和应用的。概念是公诸众人的意义参照，也是资料、数据的综合描述，是对现实世界的分类。同时，由概念引起的矛盾也比比皆是^①。在全球化进程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交流中的概念引进或再造，早已不是王国维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可以比照的了。然而，虽然“犹不得不造新名”已属常态，但是以“新名”取代“旧名”却需要斟酌。人们在全球化时代对“本土知识”的眷恋，固然反映了对“我是谁”的重新寻觅、伸张甚至构建的保守，但是又何尝不是力图将“本土知识”推向世界的自尊、自信？

在一个承认甚至逐步崇尚文化多样性的时代，学术研究的视角也呈多样化的散射，全球化的进程给学人更加多样的选择。一系列新的术语、概念正在纷至沓来，为学人提供了新视野、新理念甚至可以标新立异加以发挥的新观点。或许它们的产生符合发达的、后现代的西方社会时代特征，甚至它们也正在被谋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用来证明融入国际社会的标志。但是，作为中国学者的首要学术责任是立足于国情实际的科学研究，而不是对西

^① 转引自：【美】麦克洛斯基等：《社会科学的措辞》，许宝强等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83页。

方话语的“翻译”或“西式中文”的论说甚至削足适履的套用。“西来之说”的“本土化”固然重要，因为它体现了吸收与借鉴的必然要求；而“本土之说”的国际化又何尝不是这个过程的主题中之意？我想这应该是译介的意义。

中国学界译介外国学术著作将会是一个长久持续的学术工作，这是我们与国际学术界交流沟通的重要桥梁，也是推动自身发展的重要条件。也许有一天，中国的学术著作，包括民族学、人类学的著作会被外国学术界所译介，虽然这一天为时尚远。但是，译介国外学术著作能够为这一天更早的到来创造条件则毋庸置疑。因此，这项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需要指出的是，这套丛书的出版，时逢2009年第16届国际民族学人类学大会在中国举办，它对国内学术界更多的了解国际学界的研究成果，使国外学者认识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开放和发展的取向，无疑也大有助益。为此，我们感谢诸位译者辛勤的劳动，也感谢出版社为推出这套丛书做出的努力。同时，也期待着学界同仁、广大读者的支持和指正。

郝时远

2008年11月12日于北京

前 言

拙作《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不仅是本人进行多年深入研究和专心写作的成果，还是本人毕大半辈子试图理解民族主义——这股仍在撼动我所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的力量——的结晶。因此，我须先对自己稍作介绍。

早在童年，我就意识到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民族。我的第一个民族偶像就是《罗伯特国王及其士兵》。我是在法国的一所小学开始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正是在这里，我陶醉于有关《圣·路易斯》、《勇敢的骑士》等民族神话传说之中。后来，我转学到英国。就是在这里的第一所学校，我开始认识并熟悉《阿尔弗雷德国王及其蛋糕》的传说。由于我的父亲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一些中欧新兴国家的建立过程，加上许多参与这一进程的重要人物经常是我家的座上宾，因此，我从小就对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耳熟能详。我还从学校的教科书中学习并了解了现代的欧洲历史。显而易见，这些教科书的编纂者希望并坚信，在威尔逊自由主义时代，公民个人自由与民族自由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

当我在中学学习的最后两年，阿道夫·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总理，并将国名改为“德意志第三帝国”。中学毕业后，我立即前往德国，平生第一次对第三帝国和德意志人民进行直接的观察和了解。当我耳闻目睹得越多时，就越感到民族主义诉求与个人权利不太容易协调、一致。狂热的民族主义信念，为法西斯主义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内核，而此时法西斯主义正在德意志风起云涌。同时，狂热的民族主义信念不仅对人类自由、而且对国际社会和平也是一种威胁。因此，我转而信奉国际主义，追求一种更加美

好的未来，那就是社会主义。当时的我，与成千上万的爱国同胞相比，既不高明也不算愚钝，尽管对1939年德国与苏联签署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议》存在着困惑与疑虑，但我仍然十分钦佩苏联俄国，不仅因为苏俄作为同盟国勇敢地承担了1941年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事，而且还因为苏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从1944年“被解放的”东欧国家传来的消息和对1946年、1947年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亲身观察，我对苏俄社会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幻想破灭了，因为发现它们离现实是如此之遥远，正如从前对盛行一时的威尔逊自由主义的幻想破灭一样。

随着对民族主义研究的不断深入，伴随经常游历于欧洲、穆斯林世界和北美洲各地，还不时对其他地区作短期旅行，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阶级之间、民族之间不仅存在着不平等和冲突，而且这一切仍然是残酷的客观现实；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其他什么主义者，均没有找到有效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答案。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民族，民族之间依然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冲突；掌权的民族主义者经常犯下侵犯国内公民人权的暴力罪行；各种消除其他民族属性与忠诚的企图与行动，哪表面上打着促进人类团结的漂亮旗号，也往往难以达到其目标，反而使全世界人类相互憎恨的事件呈爆炸式发展趋势。

所有这一切使我逐渐意识到，一味地抨击民族主义对促进人类的发展与事无补。现在，我似乎更愿意口中留德，不再那么愤世嫉俗，努力寻求对人类个体、各个民族的坚忍不拔、遗憾、缺陷给予更多的理解与同情。

在我的一生中，民族主义一直是一个真切的、危险的力量；但它一直植根于历史进程之中，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若要研究民族主义，一个人必须对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感兴趣。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时，就有一个印象，即若要在社会问题与民族

问题之间、民族问题与国际问题之间划出一条清晰可辨的分界线，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过去与现在是如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这一印象在随后的岁月里被所见所闻的一切不断强化。当社会学家强调要通过相似的现象来探讨事物的共性时，当历史学家坚持每一个历史事件具有绝对的独一无二的特殊性时，我发现自己竟然赞同他们双方的看法。那种武断地拒绝进行比较的片面主义，或者只强调共性而忽视特殊性的庸俗主义，我认为都是愚昧无知的表现。这种愚昧无知之流在学术界的各个学科都可以找到。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既存在着相似的共性，也存在着有差异的个性。探索真理者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保持两者的平衡；还应该懂得，这一目标可能永远难以完全的实现。如果这一看法能够被普遍接受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减少学术界“文人相轻”的陋习。

我不打算在本书中试图去全面阐述一种常见的民族主义理论。我深知，这一领域已出现了不少学术泰斗和巨擘，如：安东尼·史密斯、卡尔和多伊奇。而且，我不愿意“东施效颦，亦步亦趋”，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行。我也不打算将民族主义作为一门学科仔细剖析，也不愿意将各种民族主义理论主张简单汇集成册。本书目的旨在：一是概述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形成；二是论述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开展的各种活动；三是分析民族主义运动以何种方式影响国家的诞生、建立和分裂；四是国家的诞生、建立和分裂反过来又如何影响民族主义运动的走向。我深知，即使在这些领域，也已涌现了不少的杰出学者，诞生了不少的优秀作品。因此，我衷心地感谢这些前辈先驱们的努力，尤其感谢两位非常卓越的学者：汉斯·科恩和尤金·伦伯格。然而，我并不认为自己完全“照葫芦画瓢”、“打灯笼照旧”。我一直努力尝试着建立一种崭新的民族理论；或者说，试图首先对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各个民族形成的历史、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脉络以及民族与

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全面的论述，进而对世界各地主要民族、民族运动及民族国家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最后对民族形成、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与国家关系得出自成一体的看法。

民族主义运动在我所生活的时代一直是国际舞台上一个突出的特征，似乎未来许多年里可能仍将保持这一趋势，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本书的目的就一直就是打算设法帮助世人了解并理解这一现象，具体说来，就是设法向我的同代人介绍并阐释这一现象，因为他们可能已经模糊地意识到这一现象并受其影响；设法向那些打算深入探讨这一现象的人们提供一些史料和一些指导性意见。本书进行了大量的民族历史的案例研究，有些民族案例涉及上下数十年的历史，还有一些民族案例穿越数个世纪之久。本书所引用的一些介绍各个民族简要历史的资料，也可以散见于其他的一些书籍和著作之中，但没有一本书像拙作这样将所有的民族的基本历史资料罗列在一起。本书的目的还在于真心劝说或帮助那些熟悉一些民族历史的人们能够了解另一些不太熟知的民族的情况。本书所引用的史料是经过慎重筛选的，因为我认为它们对本书所论述的下列进程至关重要，它们包括民族意识形成、民族独立运动、民族统一运动和通过国家行为实现的民族形成等进程。书中各章各个部分均有所侧重地论述这些与民族和国家有关的历史进程。但没有一个章节属于论述某个民族或某个国家完整历史的集大成，也没有打算撰写成这样的专论。凡是其他学者已经论述得很全面的地方，我尽量少费笔墨；凡是他们有所忽略或遗漏的地方，我则尽可能地查漏补缺。不过，无可厚非的是，每个学者均有自己的治学标准。

我一直深信，现代民族主义运动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我一直认为，我不能推卸责任而放弃审视全世界的所有民族主义运动。这就意味着我不能限定自己只关注那些熟悉的民族，而对那些自己陌生的或不太了解的民族则“置之不理”，而应一视同

仁。我阅读过不少有关民族问题的著作和作品，自认为那种论文集式的写作方法很难以获得成功。所谓论文集写作方式，即不同的专家论述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或者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不同的问题，然后再汇集成册。我比较赞赏由一个专家对某个问题进行专门论述的写作方式，尽管可能不全面或不太准确，但至少能够自成一体、自圆其说。我希望拙作能够帮助人们增进对民族、国家和民族运动等现象的了解和理解，希望能够刺激那些与我的阅历和知识结构有所不同的学者进行不同的思考，从而得出新的观点和看法，并进而纠正和改善拙作的不足与缺憾；再进而激发其他的学者对他们的观点与思想进行纠正和改进。

尽管本书篇幅较长，但我仍试图节省笔墨，使语言更加精炼。我尽量不使用华丽的辞藻来修饰我的论据、资料和观点。读者不难发现我的论述是相当平淡、直白的，但我仍然非常注重让自己的观点能够令人信服。我可以向读者保证的是，本书字里行间所透露的热情绝非平淡无奇。我始终未能忘怀那些影响我的观点和思想的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迥然相异的风土人情、巧夺天工的历史景观和五彩缤纷的文化传统，并试图努力用自己的笔端，让它们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实地考察与语言交流，热闹宣泄与孤独寂寞，亲朋好友的幸福与劫难，四大洲厚重的历史遗迹，三大洲辉煌的中世纪城市，五大洲秀美的森林河流，都汇集到我的脑海，让我感慨万千，恨不得笔下生花，一一描绘成画，样样记叙成文。要完美地表达所有的这些情感，要真正回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学、所遗忘和所保留的，显然超出了本人的能力。有尝试的想法，但不见得有如愿的结果。

我阅览群书，试图了解历史上个人、机制、思想、非个人力量、偶尔运气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发现它们是格外的复杂、变化莫测。这使得我对所谓各种综合的、科学的理论有点不太相信，甚至不以为然。我还痛苦地意识到，历史学甚至比自然科学更需

要获得持续的修正。若要保持这种修正，即使在一个人所熟悉的领域里，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要对本书所涉及的这样一个跨越时空的民族问题进行历史修正任务，甚至可以说也超出了一个人天才的能力。因此，读者可能很容易发现本书中的不少观点是陈词滥调。即使如此，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基本看法，后人的研究很可能得出与前人不尽全然一样的看法。什么是“正确”的历史观？什么是“正确的”城市观？对巴黎的看法，居住在莱茵河的渔民难道与深居城市的贵族会一样吗？

本书引用的资料来源非常广泛。第一类包括历史文献、访谈录、富有想像力的文学作品和编年报刊。其中我将对本书最有用的一些书籍已列入到参考书目之中。读者也会发现这些书籍非常有参考价值。第二类是本人至少用了40年来游览世界许多地方而获得的大量的个人访谈笔录。尽管个人谈话的记录提供的信息可能不如问卷调查得来的信息多，但它们更为鲜活生动；同时，它们还是对现有文献资料的一种有力印证。第三类是各国的游记，包括和平与战争时期大量的游记。因为我对有些国家的土著人情况可谓不太了解，或者说一无所知，又无法通过阅读当地报纸来了解，只好求助于各种各样的游记。要知道，了解一个民族，通过亲身耳闻目睹，不仅可以直接观察到该民族的各种建筑、绘画，还可零距离地了解大量的风土人情，其作用可谓“行走千里路，胜读十年书”。

毋庸置疑，一个不懂拉丁文的人要深入研究使用拉丁文的民族，显然所遭遇的困难是难以克服的，所研究的成果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专家满意、认可。有些非英文的名称，人们往往采用英文的拼写方式，尽管不太精确，但可以被广泛接受。本书对大多数的案例就是如此处理的。在论及东欧的语言时，我则大多采用了当地的方言；但有些情况处理起来非常地棘手。最难处理的就是

阿拉伯民族和中国人的名称。要原封不动地使用阿拉伯文和汉字，无论使用得正确与否，显然对本书不太合适，因为拙作毕竟不是一本研究东方语言的专著。因此，我竭力在专门用法、流行拼写和普通含义之间寻求平衡。我希望这些东方的名称能够被准确地认知，也希望读者谅解这份努力的复杂与艰难。

我最要感谢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正是由于该基金会的资助，使我得以在1971年9月在意大利贝拉焦做访问学者达数周之久；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此书的创作。我要感谢威廉·奥尔逊夫妇，正是他们为我此书的创作提供了非常惬意的写作环境。我同样要感谢斯洛文尼亚和东欧研究学院理事会，正是该会的邀请，我有幸在1975年秋季在该学院进行了一学期的研究。

我的朋友斯蒂芬·克利索得和彼德·林肯阅读了全书的文稿，他们的建议与看法是基于长期的钻研和渊博的学识，对我帮助非常之大。许多同事无私奉献，不吝赐教。我的学生和听众多年来也给予我许多的启发和鼓励。我尤其要感谢我在印第安那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同事与学生。我还想感谢出版此书的出版社，尤其要感谢安东尼·福斯特和弗里德里克·普雷格的支持与激励。

我一辈子最感到愧欠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父亲，他毕生大半辈子从事推动民族形成与国家建立的工作。正是他，激起我对民族、国家等问题的兴趣；正是他，激励我保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他，督促我深入地钻研这些问题。另一个人则在以后再提及。

休·西顿-沃森
吴洪英 译

目 录

前 言	(1)
第1章 民族与民族主义	(1)
一、民族与国家	(1)
二、民族主义	(2)
三、民族主义运动	(4)
四、民族与民族性	(5)
五、民族与部族	(6)
六、民族主义理论	(8)
七、古老民族与新兴民族	(9)
八、本书主要架构与章节重点	(15)
第2章 欧洲：历史悠久的民族	(18)
一、从帝国到主权国家	(18)
二、古老悠久的民族	(26)
三、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民族	(28)
四、法兰西民族	(57)
五、伊比利亚民族	(65)
六、荷兰民族	(81)
七、斯堪的纳维亚民族	(90)
八、瑞士民族	(101)
九、俄罗斯民族	(105)
第3章 欧洲民族统一运动	(121)
一、大大小小的德意志王国	(124)

二、意大利统一运动	(139)
三、希腊人与“伟大的思想”	(150)
四、泛斯拉夫主义	(160)
五、波兰人：从分裂到统一	(164)
六、南斯拉夫人	(178)
第4章 欧洲：多民族帝国与新兴民族	(194)
一、多民族帝国	(194)
二、波希米亚的捷克人和德国人	(202)
三、匈牙利人	(213)
四、斯洛伐克人	(229)
五、罗马尼亚人	(236)
六、乌克兰人	(250)
第5章 欧洲民族的海外殖民地	(259)
一、欧洲的对外扩张	(259)
二、从殖民地到独立国家	(263)
三、美国人	(285)
四、西属美洲各民族	(296)
五、巴西人	(304)
六、加拿大人	(306)
七、南非白人	(313)
八、澳大利亚人	(317)
第6章 西亚和北非：穆斯林帝国和现代民族	(320)
一、穆斯林帝国的兴衰	(320)
二、伊朗王国的复兴	(326)
三、欧洲殖民统治时期	(330)
四、穆斯林现代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	(332)
五、伊朗人	(336)
六、土耳其人	(342)